读史札记

庚子事变期间的长顺与吉林团练

崔　岷　尹啸为

学界有关庚子事变期间东北时局的研究多将目光聚焦于义和团的反帝斗争，而很少关注表现同样活跃的团练，且相关认知亦存在简单化倾向：或将团练与义和团截然对立，视其为清廷镇压义和团的帮凶；或将二者混为一谈，遮蔽了团练自身的行动逻辑。与之相应，对同期均有办团举措的三省将军之评价也不无偏颇，其中尤以吉林将军长顺为最，多认为其筹办团练的目的在于剿杀义和团以献媚沙俄。[①] 但若细致辨析相关史料，可知长顺的团练政策实际上经历了由排斥义和团、独办团练到合办义和团、团练再到“撤去义和、专办团练”的转变；其间，吉林团练在抗击沙俄入侵及战后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亦发挥了值得肯定的作用。厘清这些史实，当有助于重新审视长顺与吉林团练在庚难期间所扮演的角色。

一、长顺对团练与义和团的态度差异

1900 年夏，来自直鲁地区的义和团进入东北，猛烈地开展“毁路打教”活动，对奉吉黑三省的社会秩序造成剧烈冲击。与此同时，沙俄则趁着清廷京师动荡无暇他顾的机会，以保卫铁路为由向东北地区不断派遣军队。

面临俄军入侵的压力，时任吉林将军长顺迅速作出应对。一方面挑练防军，添募炮队，增兵守护北山炮台，并面饬吉林机器局总办加紧修理坏枪，添造抬枪。另一方面，针对吉省地阔兵单的难题，他又在常规的战守布置以外催促各地速办团练，将办团与练兵购械同时并举。[②]

长顺对于团练的倚重主要源于其过往的办团经验。1894 年 10 月，日军主力逼近鸭绿江防线，辽东局势岌岌可危。清廷急饬长顺拣选精锐，赴奉天协助依克唐阿作战。长顺随即动员地方官

[收稿日期] 2024-10-24
[作者简介] 崔岷（1974—　），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天津 300350，cuimin29@163.com；尹啸为（1999—　），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yinxiaovv@163.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社会组织和国家基层治理文献整理与研究”（23&ZD248）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 年，第 283 页；廖一中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78–279 页；黎光、张璇如：《义和团运动在东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17–118 页；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年，第 389–390 页；郑毅：《清代吉林将军长顺简评》，《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84 年第 2 期。

② 《兵司掌关防协领恩庆等为报现在津沽起事拟请整军备防事给吉林将军禀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吉林省档案馆合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以下简称“《边疆档》”）第 99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35–137 页。

绅办团御侮，并檄调素有骁勇善斗名号的韩家团勇编为“敌凯军”，亲率其参与四次反攻海城之战。[①] 此役成为甲午战争中清军少有的主动进攻战例，使日军颇受困扰。日方评价“清军毫不气馁，三番四次反攻海城，其间小规模战斗不断，日军苦战甚烈”。[②] 在随后的辽阳保卫战中，长顺更是获得“与日军相持半载，寸地未失，亦未大挫衄，固视诸将为优”的高度赞扬。随之出征的韩家团勇亦在历次战斗中发挥出色，“韩边外之名为敌所畏”。[③]

此外，吉林历为边防重地，俄兵时常入境滋事，兼之连年遭受马贼侵扰，故乡民已将结团自保视作一种常态防御手段。调查报告显示，吉林各属几乎处处均有团练，且大都在训练时使用新式洋枪。[④]1899 年，吉林将军延茂奉旨整顿保甲团练，制定章程十条，并加强稽查以进一步强化地方防务。[⑤] 因此，在庚子战前，吉林团练已具备相当的军事化水准。

以往较为成功的办团经历，以及吉林民团自身良好的训练基础，促使长顺在新的变局面前再度尝试倡办团练以御外安内。在得知清廷对外宣战后，长顺遂即札饬各属官绅迅速整顿团练，并对办团章程严格稽查。[⑥] 当练军文案处委员文禄禀请招募数百强健之民并按月发给饷银时，长顺一面鼓励其举“洵属见义勇为，深堪嘉尚”，一面又批示称挑练团丁之法与募兵迥然不同，令其再妥议章程。[⑦] 而对吉林分巡道达春提出的于官绅中先行择派总理、会办数员，并由其传令绅商集资办团的方法，长顺则积极采纳，并为其刊发关防，以昭信守。[⑧]

7 月上旬，随着俄军加速推进，吉林地方局势愈发动荡。长顺饬令各属查阅保甲团练，速将团勇人数及操防情形绘图造册呈报；并批准将部分精悍民团仿边军营制招募，编为“锐胜前军”，以弥补兵力之不足。[⑨] 在要隘关口如阿勒楚喀、拉林等地，长顺甚至为练团而允准将军队缓拨，严饬各营官协助团练演习枪技，待训练有成后再开赴防所。[⑩]

但对于自外省蜂拥而至的义和团团众，长顺则充满警惕，既不愿将其视为正规团练，亦无将二者合办的打算。尽管他将清廷表彰义和团的谕旨如实转札，但从其他各种举措来看，这只是为响应中央指令而做的官样文章。[⑪] 例如在收到盛京将军增祺通知其速招拳民以布置战守的电报后，长顺遂即向清廷汇报，称拳师技艺未见神奇，并以吉林“拳民无多，难遽招集”为由，

① 《吉林将军长顺为限期举办团练咨札》，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五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 4 册，中华书局，1993 年，第 136 页；张相文：《南园丛稿》第 5 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30 辑，文海出版社，1968 年，第 367 页。

② 太宰松三郎：《滿洲現代史》，南滿洲鉄道株式会社庶務部調查課編：《滿鉄調査資料》第 47 编，南滿洲鉄道株式會社，1925 年，第 18 页。

③ 易顺鼎：《盾墨拾余》，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112–113 页；顾云：《辽阳见闻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 6 册，第 350 页。

④ 守田利遠編述：《滿洲地誌》上卷，丸善株式會社，1906 年，第 346–359 页。

⑤ 《兵部为吉省拟应严查保甲练团事给吉林将军咨文》，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边疆档》第 98 册，第 375–376 页。

⑥ 《长顺为中外开衅军情紧急各属应迅整团练而卫地方事的札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选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以下简称“《义和团档》”），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74 页。

⑦ 《吉林将军衙门为文禄禀请倡办团防事札稿》，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边疆档》第 99 册，第 150–153 页。

⑧ 《吉林道达春为近日军情紧急谨将筹办团练防备情形事给吉林将军禀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边疆档》第 99 册，第 188–193 页。

⑨ 《全营翼长恒寿为拟仿边军营制招募回勇两营事给吉林将军呈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边疆档》第 99 册，第 184–186 页；《吉林将军衙门为将姓属马步练队免调他处事咨札稿》，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边疆档》第 99 册，第 206–207 页。

⑩ 《阿勒楚喀副都统钮楞额为统领穆隆阿所部之队暂请缓拨事给吉林将军咨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边疆档》第 99 册，第 164–166 页。

⑪ 《长顺奉上谕为义和团英勇助战御侮获胜给武备学堂的札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义和团档》，第 285–286 页。

婉拒增祺之请。[①] 当宾州厅同知朱材济禀请酌拨熟悉义和拳练法者来营指导拳术时，他亦回复称省中义和团尚未练熟，应先令所募新勇认真训练，俾成劲旅。[②]

出于对义和团"难以深恃"的担忧，长顺数次上奏陈说利害，希望清廷勿将义和团纳入正规民团中。但在千里之外的紫禁城内，关于义和团与团练能否合办、如何合办的争论已悄然落下帷幕。7 月 18 日，清廷的谕旨送达吉林省城，任命吉林副都统成勋、伯都讷副都统嵩昆为"义和团练大臣"，要求长顺会同二人合办义和团、团练。[③] 然而，这一致力于推动义和团与团练合流以共御外侮的政策非但未令吉林各方力量联络一气，反而导致上至吉林将军与"义和团练大臣"、下至团练与义和团之间皆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

二、清廷"义和团练大臣"政策引发的冲突

当义和团运动扩展至京畿地区后，如何妥善处理义和团民成为清廷的当务之急。御史郑炳麟为此提出派遣道府大员和公正绅士设立团练局，用"官练私团"的方法来控制义和团。[④] 然而，此法一经公开便引起激烈争论。支持者称义和团"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编入行伍。[⑤] 反对者则坚持义和团皆为无籍游民，其种种举止荒诞不经，与以"守望相助"为要旨的传统团练相悖甚远。与其将二者合办，不如选派公正绅耆认真经理保甲团练。[⑥]

随着与列强关系的恶化以及八国联军对大沽用兵，清廷于情急之下通过合办义和团、团练的决议。6 月 21 日，清廷下达宣战诏书，并谕令各直省督抚速将拳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⑦] 但与此同时，如何合办义和团、团练又成为亟须解决的难题，京官及地方督抚纷纷奏陈意见。其中有提出以义和团为主导，饬令地方官遍寻精通拳教之人编入团练中者；[⑧] 有认为义和团法术可信，但又担忧其组织松散，不易管束，因此需设立"督办民团大臣"加以统率者；[⑨] 亦有故意略过招抚义和团一事，强调应重视团练，令忠义绅衿挑募良家子弟并筹拨军械者。[⑩]

出于御外安内的双重考虑，清廷最终采纳了设立"团练大臣"以调和与控制义和团、团练的方案，谕令载勋、刚毅等亲贵重臣外出统率义和团民，又旨派李端遇、王懿荣等为团练大臣，于京津一带办团筹防；后在收到盛京将军增祺关于俄军入侵的报告后，于 7 月 10 日任命盛京户部侍郎清锐、刑部侍郎溥颋为盛京督办义和团练大臣，12 日任命吉林副都统成勋、伯都讷副都

① 《吉林将军长顺为陈吉江两省现在招募添练情形并请饬增祺等通筹全局事致军机处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以下简称"《庚子档》"）第 1 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382 页。

② 《宾州厅同知朱材济为请派熟悉义和拳技艺勇丁俾资训练团队给长顺的禀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义和团档》，第 290 页。

③ 《吉林将军衙门为奉谕吉林副都统成勋等充义和团练大臣事给边务文案处札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边疆档》第 99 册，第 266–267 页。

④ 《御史郑炳麟折》，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 年，第 85 页。

⑤ 《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奏陈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于和局无碍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庚子档》第 1 册，第 46 页。

⑥ 《直隶总督裕禄奏报遵旨筹办义和团事宜并据实覆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庚子档》第 1 册，第 21–22 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 26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40 页。

⑧ 《河南巡抚裕长奏报遵旨并案覆陈办理地方团练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庚子档》第 1 册，第 236 页。

⑨ 《山东道监察御史刘家模奏请简派督办民团大臣寓兵于民等强国之管见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庚子档》第 1 册，第 191–192 页。

⑩ 《就东省情形筹办民团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 5 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528 页。

统嵩昆为吉林督办义和团练大臣，要求其会同本省将军招集民团，认真操练。[①]

通过委任“团练大臣”会同疆吏办团以安内攘外，是清朝自咸同以降应对危机的常法。咸丰初年，为遏制太平军的兵锋，清廷先后向湖南、江西等14省委任近300名“团练大臣”，以加快各省的办团步伐；其后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期间，清廷均再度委任“团练大臣”以御外侮。[②]

因此，庚子年间“义和团练大臣”任命的出台可看成是清廷历次团练大臣政策的延续，但又因其前缀“义和”二字而具有与以往不同的内涵。此外，与先前“团练大臣”多由在籍绅士担任不同，此次“义和团练大臣”的人选均为地方官员。这一人事安排的变化，折射出清廷试图避免重蹈咸同时期“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因权力纠葛而贻误战局的覆辙。[③]出乎其意料的是，这一整合作战体系不仅未能消弭各方隔阂，反而在月余间催生出新的纷争。

首先，“义和团练大臣”政策虽暂时解决义和团能否纳入团练的争执，但未能从根本上消弭二者差异。接旨后不久，吉林将军长顺和义和团练大臣嵩昆便对办团时义和团与团练孰为主导产生分歧。作为久经沙场且颇晓外情的老将，[④]长顺主张办团应以本地团练为重，对外来义和团那套降神附体的法术不屑一顾；同驻省城内的义和团练大臣成勋在这点上与他看法一致。因此，他们在练团时都秉持重团轻拳的原则。7月18日收到上谕后，二人发布告示，表彰义和团护国义民，批准旗民公开练拳。但同时又以习拳之人“未见十分诚敬”为由对义和团进行限制，要求其选择清净处演练，不可随意编造流言揭帖而引发恐慌。[⑤]

随着战事愈发激烈，长顺和成勋加紧办团，称“省城设立团练局训练壮勇，实为目前切要之图”，委派多名官绅分任团练局总理、会办，并刊发关防以昭信守。[⑥]在训练方式上，长顺支持以练兵之法练团，批准从旗屯团练内挑拣年富力强者，令精通战阵之军官严为管带，“明虽乡团，暗予营式”，并拨发新式枪械供团勇使用。[⑦]与此同时，长顺对义和团的招募则进展缓慢，以拳民“操练日浅”“省无精团”为由加以推脱。[⑧]

而在驻守伯都讷的义和团练大臣嵩昆眼中，义和团却呈现出另一番面貌。早在战事爆发前，他便在书信中感慨义和团之神奇，将其视作国运之转机。因此，“首重义和团”便成为其御敌的不二法门。7月19日接到“义和团练大臣”任命后，嵩昆迅即招募拳民四十余名，为之设坛并分发旗帜刀矛；后又对两名法术“灵验”的神童诚心敬谨，希望以此可使洋人自烧其房。[⑨]

迥异的办团策略使长顺和嵩昆在备战上始终未能达成默契，反而互相掣肘。长顺对于向正规备战者提供军火并不吝啬，当全营翼长恒春呈报已调兵筹防，预备“会合民团，协力防剿”，唯缺军械时，他当即批准照数核发克虏伯炮、榴霰弹等物资，并从武备学堂中挑选炮术教习派

---

①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136、142、146、157–158、184、189页。

② 参见崔岷：《咸丰初年清廷委任“团练大臣”考》，《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朱寿朋编、张静庐等点校：《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783页；《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3536页。

③ 有关咸同时期“团练大臣”与地方官之间的“事权”之争，可参阅崔岷：《咸同之际“督办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的“事权”之争》，《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

④ 史载长顺早年以作战骁勇而著称，后又担任哈密帮办大臣并参与勘定中俄界约，凭“高宗御书界碑”折服俄使。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61，中华书局，2021年，第8554–8555页。

⑤ 《吉林将军副都统发布提倡习练义和拳的告示》，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义和团档》，第291页。

⑥ 《吉林将军衙门为吉林道禀请省城宜设团练局请于官绅中择派总理会办事札稿》，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边疆档》第99册，第332–334页。

⑦ 《吉林将军为批准双城堡所请从团练丁内拣挑二千名操练成旅事的札复》，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义和团档》，第297–298页。

⑧ 嵩昆等：《洋事记册》，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以下简称“《丛编》”）第2辑，中华书局，1964年，第237页。

⑨ 嵩昆等：《洋事记册》，《丛编》第2辑，第201、217、221–222页。

往该营“以资教练”。① 而对“招拳御侮”方针他则认定不具备可行性，故在面对嵩昆的各种请求时屡次推脱，敷衍了事。7 月 25 日，长顺许诺筹银三千两运往伯都讷城，供嵩昆购粮；然而数天后又以“道路不靖”为由，令嵩昆从伯都讷城库存银内自行提垫银两；此外，他在对伯都讷城的武器供应上也刻意削减数量。②

嵩昆在求援无果后，亦对长顺失去信任，故而对长顺咨文中所描述的义和团种种局限不以为然，坚持认为“义和拳果否神验，诚心则灵”。他将长顺不愿发动义和团拒敌的行为理解成“釜底抽薪，以济洋人”；对长顺筹办团练的努力则置若罔闻，反而斥其“束手待敌”，“令俄可胜而我必负”；之后甚至密函成勋，通过寻章摘句来暗示长顺“私通洋人”，离间二人关系。③ 在此形势下，清廷寄予吉林将军与“义和团练大臣”联络一气、共御外侮的厚望已俨然化作泡影。

此外，来自山东、直隶的义和团与吉林团练亦因行动目标存在分歧而难以和衷共济。一方面，东三省民众与传教士的关系整体较为和谐，“由于信仰问题所造成的仇视情绪很弱”。④ 另一方面，中东铁路的修建因规模宏大，在当时维持着数万名土夫的生活，而义和团的毁路活动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计。因此，义和团的号召在吉林民众中难以引发广泛共鸣。时人对此亦有感叹，“东三省团，提倡者不及在京之多，何为而有坏俄路者”。⑤ 随着矛盾加剧，义和团与团练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最终激化到火并攻杀的地步。⑥

吉林将军和“义和团练大臣”互相牵掣攻讦，团练与义和团彼此敌视对立，当此外患临头之际，吉林防务体系却呈现出紊乱之势。至 8 月初，珲春、三姓均告失守，宁古塔亦陷入重围，失去屏障的吉林省城岌岌可危。内外交困下，合办义和团与团练的政策迎来终局。

三、“撤去义和”后长顺的以团代兵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虽未能成功阻遏俄军推进，但长顺的团练政策在御侮方面并非毫无建树，许多团练在训练有成后即参与到抗击俄军的战斗中。当俄官萨维茨基率兵经过老少沟大道时，附近民团协助官军从隐匿之处向俄军猛烈射击，令俄方不到半小时，全连人员损失了三分之一，被迫丢弃全部马匹及其驮载之物；珲春乡团亦在作战中奋勇争先，与俄军互相攻击三昼夜未分胜负，有效弥补了正规兵力的不足。⑦

而义和团由于未得到本地民众的支持与军械粮草的补充，始终难以形成有效战力，在与俄军的交锋中往往一触即溃甚至“闻风逃散”；即便是义和团练大臣嵩昆所驻并倡办的伯都讷地区，亦未看到义和团有何亮眼表现。⑧

合办义和团、团练以御外侮的实践最终宣告失败，要隘沦陷的吉林此时也只能任由俄军驰骋肆虐。基于团练、义和团在作战中的不同表现及保境安民的考量，长顺决定调整策略，彻底

---

① 《全营翼长恒春为军务吃紧请领炮位二尊事给吉林将军呈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边疆档》第 99 册，第 315–318 页。

② 嵩昆等：《洋事记册》，《丛编》第 2 辑，第 223、242–243 页。

③ 嵩昆等：《洋事记册》，《丛编》第 2 辑，第 234、240、245、276 页。

④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1883–1913）》，张士尊、信丹娜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14 页。

⑤ 高枏：《庚子日记》，台湾学生书局，1976 年，第 66 页。

⑥ 胡思敬：《驴背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162 页。

⑦ B.B. 戈利岑：《中东铁路护路队参加一九〇〇年满洲事件纪略》，李述笑、田宜耕译，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209–210 页；《吉林将军长顺奏报近日边军与俄接仗情形并筹议攻取哈尔滨总车站以除隐患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庚子档》第 2 册，第 597 页；《珲春镶黄旗佐领等为归并乡团改为团防营各事宜给长顺的禀文》，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义和团档》，第 377 页。

⑧ 《宾州厅同知为义和拳在管界内与俄人交仗失败情形的详文》，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义和团档》，第 355–356 页。

划清义和团与团练的界限。8 月 18 日，长顺与成勋联名上奏合办之弊，强调“义和”二字“伪者固足扰民，真者亦适以召侮”，请求将其撤去，从此“专办团练，聊资保卫”。[①] 由于迟迟得不到清廷回应，二人便按自己的想法来推进团练与义和团的分离。

长顺与成勋在 8 月 31 日通报将所有省城旧有神坛拳勇一律裁撤遣散，转而专心办团。[②] 一面责成本地团练严密防守张广才岭重地，监视俄军动向，一面将完成秋操的十旗武备学堂学生归并团练一营，由团练总局管理训练，用于维护城内安定。[③] 在“撤去义和、专办团练”的方针落实后，吉林社会秩序迎来好转的迹象。然而，9 月 23 日俄军的侵入再度打破这一短暂的安宁。

俄官连年刚博夫抵达省城后，向长顺递交庆亲王“不得抵抗俄军”的手谕，随后双方开展停战议和的谈判。但正如一位报人所评，“所谓停战议和者，实际则束手降敌耳”。[④] 作为胜利方，俄军不许吉林再有正规武力的存在，先是掠走机器局内的子母枪炮并摧毁火药库，后又将银钱、马匹等物抢夺一空；城内兵勇亦纷纷抛弃军械号衣，四散而逃。[⑤] 在俄官要求下，长顺被迫将防军、新军及添练各营一概裁撤遣散。随着军事力量的溃决，吉林地方秩序亦陷入紊乱之中，盗匪溃兵“负嵎啸聚，时出掳掠”。[⑥] 如何在短期内恢复治安以保境安民，成为亟须解决的难题。

大局糜烂之下，长顺意识到“为今之计，惟有劝谕就地绅商，多办团练”，“举办联庄团练互相保卫事，于驿站居民均有裨益”，饬令交涉总局照会俄员，按站给发团练护照，尝试用团练代替军队以弥补地方防卫力量之不足。[⑦] 然而这一以团代兵的策略在实行过程中又面临新的难题。首先是俄军因猜忌而频繁下乡巡查，肆意收取练会枪械，导致地方官绅办团进程缓慢，“练会已成复散者不知凡几”。[⑧] 针对俄人干扰，长顺亲赴俄官所在处进行交涉，与之面订条约，使其最终做出让步，承诺不再收取练会之枪。[⑨]

战乱后地方军火的匮乏成为阻碍办团的又一因素。俄军收枪后，各地绅商纷纷以枪弹不敷向将军衙门请拨军械，用以练团。面对接踵而至的支援请求，长顺一面将省城中尚存的枪械火药酌量拨给，[⑩] 一面奏请清廷饬令江督刘坤一提供援助，由此为吉省请得“快枪三千杆，洋火药

---

① 《吉林将军长顺等奏请撤义和二字专办团练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庚子档》第 2 册，第 823–824 页。

② 《吉林义和团练大臣成勋为省城各坛一律裁撤添募勇营事给吉林将军咨文（附清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七日，《边疆档》第 100 册，第 97 页。

③ 《吉林将军衙门为派管带唐殿荣会同团练严密防守张广才岭事札稿》，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边疆档》第 100 册，第 130–131 页；《吉林将军衙门为十旗兵操已满改归团练总局管理事札稿》，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边疆档》第 100 册，第 146 页。

④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4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年，第 43 页。

⑤ 《“鉴空衡”函》，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五日，鲜俊英原编、谢承仁集释：《庚辛奉天书简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7 页。

⑥ 《吉林将军长顺为奏裁撤边军仍留练队事给边务文案处札文》，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边疆档》第 100 册，第 288 页。

⑦ 《吉林将军衙门为举办联庄团练相互保卫事咨札稿》，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边疆档》第 100 册，第 269 页；嵩昆等：《洋事记册》，《丛编》第 2 辑，第 289 页。

⑧ 《吉林将军长顺等奏请饬全权大臣与俄使商允吉林自添兵力豫为该国撤兵保全地方片》，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庚子档》第 4 册，第 1694 页。

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宗》，盛京将军增祺，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九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号：01–14–008–01–005。据称长顺在交涉时不肯退让，面对俄人恐吓，以“拼我老命”之语相抗争。魏震等：《南满洲旅行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 45 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23 页。

⑩ 《吉林将军衙门为商民李庆荣等举办团练恳发火药并照会俄官发给执照事札稿》，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边疆档》第 100 册，第 249–252 页。

十一万五千斤”等军火。[①]

为进一步调动地方办团的积极性，长顺还采取保奏等方式来嘉奖安民有功的官绅团练。蒙古旗协领庆禄前因“不识大体”被长顺奏请降职，但随后在办团方面成效显著，“所练数千人，俨成劲旅”；停战后又率领团勇力阻俄兵骚扰。长顺得知其功绩后，立即为之呈请撤销处分。[②]吉林南山团练为保卫闾阎而在各要道设卡，昼夜巡查，缉拿多名盗匪。长顺亦专折上奏，建议对表现优异者予以嘉奖。[③]

在长顺的鼎力支持下，各地团练重新兴办。与同一时期筹办却在战后溃散的京津团练相比，吉林团练长期维持着较高的军事化水平，并为保境安民做出了贡献。如桦甸各团练会购置抬枪，筑设炮垒，日夜巡防，“因自卫森严，马贼近于绝迹”。[④]韩国视察使李范允以索取越垦地面为名，率韩兵过江侵扰，“驱杀华人，逼胁垦民，自白金社以西直抵长白山悉为占据”。延吉各社练总亲率团丁前往助剿，将韩兵悉数驱逐过江，地方一律肃清。[⑤]

四、结语

李文海教授在《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一文中曾呼吁“不能简单地以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作为判断当时某个政治派别和政治人物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⑥]这一灼见同样适用于评价长顺及其筹办的团练在庚子国难期间的表现。尽管吉林团练最终未能成功抵挡沙俄入侵，但今人仍不宜因此忽视甚至否认其在庚难中御侮保民的努力及成效。同时，对于在危机中及时改弦易辙，“专办团练”以破解困局，使吉林避免奉黑二省“师熸城陷”“死者数十万”惨剧的长顺，用“保境睦邻，脱数百万生民于豺牙虎口，间得不横噬以尽，可谓社稷臣矣”[⑦]来评价其在庚难中的表现似也并不为过。

通过梳理庚子事变期间长顺的团练政策，不难发现他实际上经历了从排斥义和团、独办团练到合办义和团、团练再到“撤去义和、专办团练”的转变。换言之，长顺在起初办团时便未将镇压义和团作为主旨，更多是基于抵御外侮与维护秩序的双重考量；合办时在衡量团练与义和团的实际战力后对义和团“明为倡导，暗中遏制”，转而扩大团练规模；最终推动二者分离，是时局变化下为保境安民所做出的务实之举。此外，地方民众对义和团的态度，因战火造成的信息阻隔及清廷对东北局势无暇兼顾等因素亦是此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的必要条件。

学界长期以来对庚子事变期间长顺团练政策的调整及吉林团练实际动向的忽视或误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由于过度聚焦义和团本身，研究者往往对“义和团活动地区的非义和拳民众的历史”关注有所不足，[⑧]因此不妨尝试将目光从义和团转换至各级地方官员与绅民团练上，并深入考察多方力量之间的互动及其对国家基层治理的影响。

---

① 《外务部全宗》，吉林将军长顺等，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号：02-01-001-01-009。

② 《宫中朱批奏折》，吉林将军长顺，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6-0265-055。

③ 《军机处档折件》，吉林将军长顺等，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号：故机 150336、149540。

④ 守田利遠編述：《滿洲地誌》下卷，第 450-451 页。

⑤ 《军机处档折件》，署理吉林将军富顺等，光绪三十年四月十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号：故机 161099、160278。

⑥ 李文海：《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288 页。

⑦ 民国《布特哈志略》，《中国地方志集成·黑龙江府县志辑》第 10 册，凤凰出版社，2006 年，第 324 页。

⑧ 桑兵：《继续义和团研究的理念与取径》，《史学月刊》2023 年第 10 期。